

《四書五經大全》與明代科舉令甲 關係考

姜龍翔*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四書五經大全》與明代科舉令甲之關係，辨析大、小注是否具功令權威性，並釐清科舉主《大全》說的成因。研究方法主要利用文獻分析，對於明代典章政書、實錄史料、文人著作、科舉錄試官批語等相關材料進行探究，縷析其中論述《大全》與程式功令關係文字，從而確認在永樂年間並未發布以《大全》取代洪武程式之詔令，頒行《大全》乃是朱棣對洪武程式的實踐，欲令其作為經義程式的輔翼教材，並非要取代成為科舉令甲。因此，本文指出學者將《四書五經大全》視為明代科考令甲的說法並不正確，並證明主《大全》說乃出自晚明儒者的誤解，明代科舉令甲終始主洪武程式，《大全》小注只是作為閱讀輔助，非令甲所尊。

關鍵詞：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明代經學、科舉程式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明代經學向來被視為經學衰落時期，尤其《四書五經大全》更被認為是造成明代經學衰微的關鍵，顧炎武（1613-1682）即指《大全》編修儒臣直接抄謄前人成書，配合八股文用於科舉，感嘆經學之廢，實自此始。¹《大全》之所以具此影響，皆因與科舉之密切關係，學者多以《四書五經大全》為明代科舉功令，自其頒行後，拊制學術風氣，致漢唐古義廢棄不講，嚴重影響明代經學的發展。

以《大全》為科舉功令，可謂學界共識。清儒費密（1625-1701）云：「永樂得位，專用朱熹之說，始不遵祖訓，仍宋舊本作《四書五經大全》，命科舉以為程式。」²即指明朱棣（1360-1424）不遵祖訓，以《大全》為程式功令。《四庫全書總目》稱胡廣（1369-1418）《四書大全》：「有明二百餘年，懸為功令。」³視《四書大全》為明代科舉功令。於《書傳大全》之提要云：「洪武中尚不以蔡《傳》為主，其耑主蔡《傳》，定為功令者，則始自是書。」⁴則說專主蔡《傳》功令自《大全》始；於《周易大全》提要則指出：「二百餘年以此取士，一代之令甲在焉。」⁵令甲就是功令，此提要也是以《周易大全》為科舉功令。

受四庫館臣影響，《大全》為取士功令成為對明代科舉的認識。劉師培（1884-1919）《國學發微》即說：「夫明人經學之弊，在于輯《五經》《四書大全》，頒為功令。」⁶馬宗霍（1897-1976）《中國經學史》也說：「明自永樂後，以《大全》取士。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講章為經學，以類書為策府。其上者復高談性命，蹈于空疏。儒林之名，遂為空疏藏拙之地。」⁷劉師培、馬宗霍都認為明以《大全》取士，造成明代儒學空疏。當今學者亦多持此種看法，郭萬金云：

¹〔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見樂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卷18，頁1043。

²〔清〕費密：《弘道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4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民國九年〔1920〕大關唐氏怡蘭堂本），卷上，頁20上。

³〔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卷37，頁33下。

⁴同前註，卷12，頁14上。

⁵同前註，卷5，頁2上。

⁶〔清〕劉師培著，萬仕國點校：《國學發微：外五種》（揚州：廣陵書社，2015年），頁49。

⁷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134。

「《大全》以國家修訂之尊崇地位，攜天子詔令，風行天下，遂成一代令甲。」⁸周群也說《四書大全》：「在明代被懸為功令，對明代儒士產生了重要的影響。」⁹林慶彰則總結學者指責《大全》主有二點：「一是《大全》採用宋、元人的說法，使漢、唐古義淪亡。二是以《大全》取士，使經學日漸衰落。」¹⁰可見這類以《大全》為明代科舉功令、取士標準，使有明經學衰敝的批評，實為學術界長期看法。然亦有學者對於《大全》定位並未給予過高肯定，李威熊說：

成祖以後，經中期而晚期，《五經、四書大全》就像今天各級學校聯考的參考書一樣，是民間流行的經書，只不過是官訂而已；它雖不登經學大雅之堂，但不能不承認它對民間學子影響之大。¹¹

李威熊雖認為《大全》對民間學子影響極大，卻指其定位相當於官訂參考書。若《大全》為令甲，當為標準教本，不可謂為參考書，這樣的界定，似乎對《大全》存在某種程度的認知差異。

何謂功令、令甲？簡言之即為法令。功令為古時考核和選用學官之法令，司馬遷於〈儒林列傳〉開篇即自言曾讀功令，對於漢代廣厲學官表達慨嘆之意。令甲之名亦起於漢代，以其令有甲有乙，而令甲為首條法例，具有重要性。尤其科舉令甲為國家重要政策，通常需由帝王詔令或禮部批示頒定，學者把《大全》視為明代科舉令甲，主因其書由明成祖敕纂，頒行天下，成為明代科舉評閱依據，因而視其為科舉令甲。然而祝允明（1460-1526）〈答張天賦秀才書〉曾對永樂是否變改洪武科舉程式提出質疑，他說：

⁸ 郭萬金：《明代科舉與文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105。

⁹ 〔明〕胡廣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書大全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

¹⁰ 林慶彰：〈《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問題探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創刊號（1991年3月），頁377。

¹¹ 李威熊：〈明代經學發展的主流與旁支〉，收入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年），頁84。

請觀皇祖開科詔旨，士治五經，皆先以漢唐注疏，參以宋傳，不知今日何為而不從聖訓也？或者概諉以朝廷以《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為準的是矣，又不知太宗亦有詔旨必令禁斷古註疏否歟？¹²

祝允明強調洪武開科詔旨可兼用漢、宋經說，後人卻棄用古注疏，這是不遵太祖聖訓的行為。他甚至以反問語氣質疑成祖是否曾有禁斷古注疏之詔令，言下之意並不認為朱棣曾下令以《大全》取代古注疏。又朱彝尊（1629-1709）〈經書取士議〉曾說：「永樂諸臣纂修《大全》，類攘竊一家之書以為書，廢注疏不采，先與取士程式不協，何得謂之大全乎？」¹³《大全》攘竊前書，廢棄注疏，此為清儒批判共識，但何以朱彝尊又說《大全》與取士程式不協？洪武年間，朱元璋（1328-1398）曾公布科舉經義程式，彼時多可兼用漢、宋經說，所謂不協當指不符洪武程式，然若朱棣已詔改《大全》為程式，自為一代新令，何必責其不協？且若無詔令規定，《大全》又是如何成為取士標準？今人朱治也注意到這個現象，他說：「《大全》頒布之初，雖無直接的制度規定科舉只用《大全》，亦無直接材料表明《大全》在培養人才中的具體作用，然《大全》在實際上成為明代儒學教育的主要教材。」¹⁴朱治並未見到以《大全》為功令的規定，但他並未深入探討，依舊直接認可《大全》的教材地位。然若成祖未發布以《大全》為令甲的詔示，則《大全》的地位是否會如此重要？對此，侯美珍曾發表〈明科場由尊《大全》到不讀《大全》考〉一文，指出：

四庫館臣等前人，言明代科場以《大全》為令甲，不算錯誤，確實曾經有過「主《大全》」時期，但由本文以上之探索、釐析，可知這是不準確的說法，正統以後，《大全》已逐漸失去其科場的主導地位。¹⁵

¹² 〔明〕祝允明：《懷星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卷12，頁23下-24上。

¹³ 〔清〕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影印中華書局1936年版《四部備要》本），卷297，頁1531。

¹⁴ 朱治：《元明朱子學的遞嬗：〈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195。

¹⁵ 侯美珍：〈明科場由尊《大全》到不讀《大全》考〉，《中國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夏之卷，頁36。

侯美珍認為《大全》於永樂初頒之際，確實曾為令甲，主導過科舉；但從英宗正統之後，科場獨尊地位便不復存在。這也表示明代以《大全》為獨尊令甲僅實施約二十餘年而已，若永樂時期曾明定《大全》為令甲，何以這麼快的時間內，學子便不予重視？

綜合以上論述，明代科舉程式主要制定於洪武年間，成祖雖修纂《大全》，但是否下詔改變令甲，選擇獨尊《大全》？仍有疑慮。且《四書五經大全》分經文、傳注及所集諸儒之經說，傳注又稱大注，所採諸儒經說則稱小注。若以《大全》為功令，該尊主大注？或亦需尊小注？學界也少有討論。有鑒於此，《四書五經大全》的功令地位及其與程式標準之關係究竟如何？這是本文欲加探討之問題。

二、明代科舉功令考

據《明史·太祖本紀》所載，洪武三年（1370）設科取士，十七年（1384）又頒科舉取士式，這兩次科舉皆曾公布遵用之經義程式。以孔貞運（1574-1644）《皇明詔制》為例，其書載洪武三年詔下「鄉試會試文字程式」，第一場試中關於經學程式為：

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不拘舊格，惟務經旨通暢，限二百字以上。《易》：程氏、朱氏註、古註疏；《書》：蔡氏《傳》、古註疏；《詩》：朱氏《詩傳》、古註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古註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¹⁶

在開科詔令中，諸經多載明可兼用宋人傳注與古注疏，唯《四書》未標明程式。至於洪武十七年之程式，與開科程式略有不同，《大明會典》載：

¹⁶ [明]孔貞運：《皇明詔制》，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5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明崇禎七年〔1634〕刻本），卷1，頁31上。

《四書》義主朱子《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¹⁷

部分經義程式發生專主程朱的改變，《四書》主朱子、《易經》主程朱、《詩經》主朱子，至於《書》、《春秋》、《禮記》仍一襲前制，可兼用古注疏。

明初科舉程式雖已減少採用古注疏，仍有半數經典可兼用宋人傳注及古注疏，然頒行《大全》之後，情形又有轉變。前引《大明會典》在說明洪武十七年程式後，下注解云：「後《四書》、《五經》主《大全》」。¹⁸主《大全》亦見於俞汝楫《禮部志稿》所載〈科舉通例〉中，亦於洪武十七年定式下以注文標示：「後《四書》、《五經》主《大全》」。¹⁹同樣文字還出現於張朝瑞（1536-1608）《皇明貢舉考》以及王圻（1530-1615）《續文獻通考》之中，皆是引用洪武十七年科舉成式後，再說後來《四書》、《五經》主《大全》。這些資料應有淵源關係，但皆未載明以《大全》為程式的詔令文書，那麼何以會有「主《大全》」的說法？在其他文獻中，是否有明確要採《大全》為功令的規定？以下試再就相關史料文獻進行探討。

（一）詔令彙編中的記載

「主《大全》」的意思，應該代表科舉乃以其作為程式令甲，那麼在明代詔令文書中也應當有相關規定，故而以下先就現存明代詔令文獻進行考察。

1. 霍韜（1487-1540）主編《皇明詔制》，刻於嘉靖十八年（1539），收錄有洪武三年〈設科取士詔〉，卻無十七年科舉定式及永樂年間關於科舉之詔文。

2. 同樣成書於嘉靖十八年的傅鳳翔（1487-1551）《皇明詔令》，載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所頒之〈初設科舉條格詔〉，亦無洪武十七年及永樂年間變更科舉詔令。

3. 刻於崇禎七年（1634）之孔貞運《皇明詔制》，其書據霍韜本重編，故所

¹⁷ [明]申時行修：《大明會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9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明萬曆內府刻本），卷77，頁11上-11下。

¹⁸ 同前註，頁11下。

¹⁹ [明]俞汝楫：《禮部志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7冊，卷23，頁13下。

記明初詔令與霍韜本大致相同，僅收錄洪武三年〈設科取士詔〉，未見永樂年間詔令修改科舉的命令。

上述資料均只有載錄洪武三年初設科舉時的開科詔令，未見十七年科舉成式及關於永樂《大全》取代古注疏的詔令。洪武三年首開科舉，開科詔令具有重要的典禮意義，自然會被收錄，但何以卻未見收錄洪武十七年或永樂年間頒布的科舉程式？《四庫總目》評價霍韜《皇明詔制》時說：「是編載明代詔制，始洪武元年，終嘉靖十八年，大抵皆典禮具文，不足考一代之政令。」²⁰陳時龍也說：「一代之政令，不可能完全讓統治者以公開的詔書形式宣布。」²¹這些彙編自然不可能收錄所有詔令文書，因此要考察是否有以《大全》取代洪武程式的命令，尚須就其他典章政書等相關史料探討。

（二）政書史料中的記載

明代政書史料等文獻中，是否載有十七年科舉成式及永樂年間修改令甲命令？以下試再分析：

1. 姚廣孝（1335-1418）《明太祖高皇帝實錄》有記：「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²²但在太宗實錄中，未能找到頒定《大全》為科舉功令的記錄。

2. 黃光昇（1506-1586）《昭代典則》於洪武三年記有設科取士詔令，於洪武十七年也載有「三月戊戌頒行科舉成式」。²³《昭代典則》主要記載元至正十二年（1352）至明隆慶六年（1572）之相關史事，其書按年分纂，雖記洪武三年及十七年程式，依舊沒有永樂主《大全》命令記載。

3. 王世貞（1526-1590）《科舉考》記錄洪武三年至萬曆十七年（1589）科舉相關史事，其書開篇即載洪武初科舉條格，十七年時則記：「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²⁴同樣沒有永樂年間規定《大全》為科舉程式的命令，只記錄到永樂二十二

²⁰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卷 56，頁 3 下。

²¹ 陳時龍：〈明代詔令的類型及舉例〉，《明史研究論叢》第 8 輯（2010 年 7 月），頁 131。

²² [明]姚廣孝等：《明太祖高皇帝實錄》（鈔本，約西元 14 世紀），卷 160，頁 1 上。

²³ [明]黃光昇：《昭代典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35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周曰校萬卷樓刻本），卷 9，頁 47 下。

²⁴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12 冊（臺南縣：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6 年，影印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刻本），卷 9，頁 5 上。

年（1424）廷試後修改狀元名次之事，無關乎科舉程式。

4. 徐學聚（1556-?）《國朝典彙》專收明穆宗以前掌故，其書於永樂年間記有十八年（1420）六月「命禮部自今科舉取士在大誥律例內出題試諸生」，²⁵其餘皆為及第員額與瑣碎事務，並未涉及程式規定。

5. 萬曆時所修《大明會典·科舉通例》記載有洪武三年開科取士內容、十七年詔令三場的程式標準，並未記錄永樂年間涉及《大全》的相關資料。

上述文獻都記載了洪武三年及十七年的令甲程式，卻未提到永樂朝曾有頒行以《大全》為科舉程式的詔令，因此在官方文獻中，並未能找到以《大全》為令甲的記錄。頒行《大全》為永樂文教大事，若其被修訂為科舉令甲，官方無由對此事毫無記錄

（三）文人對科舉程式的論述

明代史料政書皆未能檢視到永樂時期科舉修改詔令，接著可再考察文人討論科舉事務文字，以確認明儒對科舉程式之認知。

1. 黃瑜（1426-1479），景泰丙子（1456）舉人，屢試甲科不第，授廣東長樂縣知縣。黃瑜撰《雙槐歲鈔》，乃記其三十歲游學京師後所見所聞，其中有〈國子試魁〉一文，記朱元璋據夢取魁傳聞，開篇說：「洪武甲子重定科舉之制，即今三場程式也。」²⁶洪武甲子為洪武十七年。黃瑜生於永樂之後，卻說當時科舉三場程式乃洪武所定之制，三場程式所指可能包含首、二、三場所考文體、篇數及功令程式等規定，可見洪武程式影響深遠。

2. 袁仁（1479-1546）《砭蔡編》序文提到：「襄兒就塾師，習《尚書》，專求通蔡氏《傳》為案據。余攷國朝令甲，《書》主古註疏，兼蔡《傳》，初未嘗專主蔡也。學者以註疏繁而難閱，遂棄不觀，然而非制矣。」²⁷袁仁撰寫《砭蔡編》是為指導兒子袁襄閱讀《尚書》門徑。袁襄因入塾就讀，學習《尚書》，塾師專

²⁵ [明]徐學聚：《國朝典彙》，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65冊（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影印明天啟四年〔1624〕徐與參刻本），卷128，頁16上。

²⁶ [明]黃瑜：《雙槐歲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陸延枝刻本），卷2，頁7下。

²⁷ [明]袁仁：《砭蔡編》（明萬曆間嘉興袁氏刊本，約西元16世紀），〈砭蔡編自序〉，頁1上-1下。

授以蔡《傳》，使袁仁不滿。於是袁仁考察明朝功令，發現應以古注疏及《書集傳》並為標準，專宗蔡《傳》為非制，可見他認為明代科舉令甲即洪武程式所規定，永樂《大全》並未變改標準。

3. 王世貞為明代著名文人，他有志於為明撰史，勤奮搜集實錄、檔案文書以及野史家乘等材料，編成《弇州堂別集》一百卷，後董復整理遺著，又刻《弇州史料》一百卷，包含明代政治、經濟、典章、風俗等各種內容。《弇州史料·前集》有《科舉考》，記洪武至萬曆年間科舉事務，其〈科舉考序〉載：「洪武三年取畿內諸貢士，尋未及會試而官之，明年始復試，得進士吳伯宗等，以為諸儒士多未脫佔嚙，無益天下大計，罷之。又十三年而始更布條式，載在甲令，二百年來公卿大夫之業皆出于此易代之際。」²⁸王世貞批評洪武第一次取士多屬記誦之士，又說十七年始更新程式，載於令甲，其後二百年公卿大夫習業皆出於此時規定，意謂明朝取士之制皆以洪武十七年程式為準則。

4. 張朝瑞，隆慶二年（1568）進士，撰《皇明貢舉考》，歷記洪武三年至萬曆十一年（1583）科舉試題、程文之目、進士名錄等。首篇〈開科詔令〉在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的文字後有下按語云：「瑞按：洪武三年庚戌初鄉試，四年辛亥初會試、殿試，五年再鄉試，六年以後蓋罷科舉者十有一年，至十七年復鄉試，十八年復會試、殿試，以後永為定制，此開科之大略也。」²⁹張朝瑞卒於明神宗萬曆十六年（1588），他論述洪武十七年科舉成式後，稱其永為定制，表示他認為萬曆以前科舉皆用洪武程式為標準。另外，《明史》也採用永為定制之說，稱洪武十七年「始定科舉之式，命禮部頒行各省，後遂以為永制。」³⁰前引《明史》曾說永樂頒《大全》，廢注疏不用，此處又說明代科舉皆沿洪武十七年定式，以為永制，表示明史館臣亦對此問題認識模糊。

5. 黃鳳翔（1538-1614），隆慶二年進士，曾參與《世宗實錄》及《會典》纂修工作。著有詩文集《田亭草》，其中有其代作〈山東鄉試錄〉云：「今天下儒術大明矣，經籍傳註，著在功令，學者尺寸而守之，信若著龜。」³¹記載傳註之令

²⁸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科舉考序〉，卷1下-2上。

²⁹ [明]張朝瑞：《皇明貢舉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8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明萬曆刻本），卷1，頁4上。

³⁰ [清]張廷玉：《明史》，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原刊本），卷70，頁4上。

³¹ [明]黃鳳翔：《田亭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5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甲乃洪武程式，若永樂改尊《大全》，會包含小注，黃鳳翔就不該只說令甲為傳註而已。

6. 姚舜牧（1543-1627），萬曆元年（1573）舉人，著有《易經疑問》、《書經疑問》、《詩經疑問》、《禮記疑問》、《春秋疑問》和《四書疑問》各十二卷。其〈尚書疑問序〉說：「唯舉業制科，一遵傳註，載在令甲。」³²此說與黃鳳翔同，皆以令甲為傳註，非指《大全》。

7. 胡忻（1556-1616），萬曆十七年進士，曾任太常寺少卿。晚年將其奏疏集結為《欲焚草》，其〈申飭科場功令疏〉云：「至於《春秋》命題，當以聖經為主，以胡《傳》為宗。近多搜隱撰新，牽合附會，有單經無傳，工小註，立說若有本，非傳意。」³³胡忻為萬曆年間進士，他認為《春秋》科考近來卻有工於小注而與胡《傳》歧異者，他稱此為搜隱撰新，牽合附會，要求申飭功令，可見胡忻不以小注為功令。

8. 高攀龍（1562-1626）〈崇正學闢異說疏〉云：「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稟于是。」³⁴萬曆二十年（1592），張世則（1542-？）批判朱子學，要求變更朱子《大學章句》，高攀龍此疏即於是年提出，反駁其說。至於他說二百餘年以來，制科、庠序皆稟於是，乃指朱子學。但周群卻說：「自《四書五經大全》頒行之後，諸注疏皆廢，成為科考的不二標準。乃至其後『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稟于是。』」³⁵他將高氏此言作為《大全》被懸為功令的證據。然萬曆二十年距永樂十三年（1415）為 177 年，不符高氏二百餘年之敘述，若以洪武十七年計算，則相距 208 年，便可符合二百餘年之記數。因此高攀龍所指制科、庠序所稟者乃指洪武程式，非為《大全》。

9. 蔡獻臣（1563-1641）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上〈燒燬四書書經刪正等書劄各提學〉，針對袁黃（1533-1606）《四書刪正》、《書經刪正》敢刪修朱《注》、蔡《傳》提出批判，其文有云：「我明頒布《四書集註》、《尚書集傳》於學宮，

年，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1612〕刻本），卷 19，頁 27 下。

³²〔明〕姚舜牧：《來恩堂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0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明萬曆末年刊天啟間增補本），卷 1，頁 11 下。

³³〔明〕胡忻：《欲焚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第 3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胡恆升刻本），卷 3，頁 31 上-31 下。

³⁴〔明〕高攀龍：《高子遺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2 冊，卷 7，頁 1 上。

³⁵〔明〕胡廣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書大全校注》，頁 2-3。

著為功令，家傳戶誦，迄今二百餘年無異學。」³⁶此文與高攀龍〈崇正學闢異說疏〉同以二百餘年為計。然其時距永樂頒《大全》為 188 年，仍不足二百之數，故其所說著為功令亦指洪武程式。

10. 姚希孟（1579-1636），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其著述《響玉集》有云：「然高皇帝制為功令，三載取士，經術與世務相參而行之日久。」³⁷姚希孟亦是萬曆年間人，他說科場功令及三年一試規定為太祖所制，至今仍行，未含《大全》。

11. 馬世奇（1584-1644），崇禎四年（1631）進士。李自成（1606-1645）破北京時，自縊而亡。其《澹寧居文集》云：「高皇帝神武開天，而絀詩賦，用經義，曰聖賢之神，于是乎傳。惟有之，故似之也。傳註之耑用宋儒，疑于拘，曰：將以約其軼也。文皇帝繼之而頒《四書五經大全》諸書于頤宮也，疑于贅，曰：將以廣其固也。」³⁸馬世奇認為明太祖專用宋儒傳註，明成祖頒《大全》於學宮，雖有各有拘執繁贅之弊，但目的在增廣學習，可見他並不以《大全》為取代明太祖的功令程式。

12. 陸符（1597-1646），崇禎十四年（1641）以保舉人入太學，次年登順天賢書。明亡後，魯王監國，賜進士。《明文海》收其〈時文易題辭〉說：「然兩祖明詔，勅舉子得雜用《程傳》、註疏，載在令典。於《四書》、《五經》又各纂修《大全》，列之學宮。聖明度越，誠不欲專私家學以成經術之陋也。」³⁹陸符指出兩祖明詔准許舉子於《易》雜用程《傳》及古注疏，表示他認為成祖依循太祖科舉詔令，未有改變。至於纂修《大全》目的則是提供學宮講習教材，並非變更科舉程式。

上述資料皆顯示明代科舉定式於洪武年間頒定，雖以宋人傳注為主，亦可採古注疏。《大全》則主要根據洪武科舉定式中的宋人傳注修纂而成，除《禮記大全》所主的陳澧（1260-1341）《集說》外，餘皆符合洪武程式中的宋人傳注，然據劉柏宏研究指出：「陳澧《禮記集說》在洪武年間已成為官方指定的科舉用書。」

³⁶ [明]蔡獻臣：《清白堂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陸輯》第 2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明崇禎刻本），卷 3，頁 35 上。

³⁷ [明]姚希孟：《姚孟長全集》（明崇禎蘇州張叔籟刊本，約西元 17 世紀），卷 5，頁 23 上。

³⁸ [明]馬世奇：《澹寧居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第 113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卷 3，頁 36 下-37 上。

³⁹ [明]黃宗羲：《明文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53 冊，卷 310，頁 4 下。

⁴⁰則《禮記大全》亦是沿襲洪武舊規，非為創新。也正由於洪武時期程式屢更，加上朱棣又頒《大全》，限縮傳注，遂令官方及考生皆被混淆，是以袁仁必須考察一番，方知國朝令甲不專主蔡沈。又如楊慎（1488-1559）在萬曆十九年（1591）時為雲南鄉試錄所作之序文中也云：

嘗伏讀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詩》采漢賡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古註疏與陳澧《集說》，裁訂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孟復生，亦無異論也。⁴¹

楊慎自稱曾閱讀科舉詔令，但他所舉的傳注規範卻綜合洪武三年及十七年程式，如他所說《易》用程朱，與十七年程式相符，並無古注疏；《詩》採漢箋與《集傳》，則為洪武三年規範，十七年時已獨尊朱《傳》；甚至《禮記》兼用古注疏與陳澧《集說》的說法，也不符合洪武年間兩次程式。再如王世懋（1536-1588）〈感德碑記〉載：「我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以《四書》、《五經》程士，詔皆從朱氏說。」⁴²所謂皆從朱氏說，應自《大全》專主宋儒傳注始，王世懋卻籠統地以為太祖所定。這些例子反映明代官方及士人本身對於科舉標準規範的認知相當混亂。

明人對科舉程式規範確實認知混亂，除了一般以為不用古注疏的現象外，甚至也有不重宋元傳注的情況發生。雷禮（1505-1581）《皇明大政紀》記載憲宗成化十三年（1477）時，時任詹事府少詹事的黎淳（1424-1483），曾針對科場出題及作文定式提出奏疏。黎淳建議：「科場出題、作文定式，洪武年間已嘗頒降，近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移文所司將考試官究治，申明科場舊制，頒降學校，永為遵守。」⁴³黎淳指出科場舊制於洪武年間頒行，但現在所刊程文在

⁴⁰ 劉柏宏：〈永樂朝之前陳澧《禮記集說》的傳播及其相關問題探討〉，《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53期（2018年9月），頁103。

⁴¹ 〔明〕楊慎：《升菴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0冊，卷3，頁5下。

⁴² 〔明〕王世懋：《王奉常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3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年，影印明萬曆間刻本），卷13，頁3下。

⁴³ 〔明〕雷禮等：《皇明大政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明萬曆三十年〔1602〕博古堂刻本），卷15，頁90下。

出題及定式皆偏離舊制，故他請求重新申明，俾令學校永為遵守。憲宗回應云：「科舉重事，各處出題刊文等事，何為違式差謬？該部會同翰林院學士等官、覆奏考試等官，務取學行老成之士，不許徇私濫舉。出題校文，并刊錄文字，必須合式，依經按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等官干預。」⁴⁴憲宗要求程文合式，依經按傳，表明當時確實存在不合程式傳注的現象。王演疇（萬曆壬辰進士）〈尚書集解序〉也說：「予每觀業舉子者，其說書則今昔互異。先時確遵傳註，奉為守墨傳衣，後來崇尚新說，一意操戈翻案，以自見其奇。物極則反，至於今始復為尊朱也。不數年屢變矣。」⁴⁵袁黃《遊藝塾續文規》載薛應旂（1500-1574）之說亦云：「近來士風轉陋，文運益卑。駕言于尊朱，而并朱註亦不復理會。」⁴⁶這都表明宋儒傳注亦未被嚴格執行於科舉規範中，是以袁宏道（1568-1610）稱天下人幾乎將令甲當成兒戲，他說：「夫高皇帝範圍天下之道，託于經傳，而章程于宋儒，此其中自有深意，故洛閩之學脉窮，則高皇帝之法意衰。臣見天下之以令甲為兒嬉，而變更之無日也。」⁴⁷敢於任意變更令甲，表明官方程式並未受到嚴格規範限制，不乏考官舉子任意去取，以迎合趨勢，這也顯示不少人並不清楚令甲標準究竟為何。

（四）考官批語所反映的程式標準

《大全》既頒行學校，為一時風尚，學子必然會使用《大全》說法應考。然小注與大注存在不少違異情況，若考生使用不同於大注的小注異說，考官接受度如何？首先，據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中考官閱卷評語來看，其評判標準仍為傳注，如永樂十八年（1420）浙江鄉試批《易》卷云：「經義融會傳注，文采蔚然。」⁴⁸

⁴⁴ 同前註，卷 15，頁 90 下。

⁴⁵ 〔明〕王演疇：《古學齋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伍輯》第 1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刻本），卷 1，頁右 6 下-右 7 上。

⁴⁶ 〔明〕袁黃：《遊藝塾續文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1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明萬曆三十年〔1602〕刻本），卷 1，頁 27 上。

⁴⁷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74 冊（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 年，影印明崇禎二年〔1629〕佩蘭居刻本），卷 2，頁 27 下。

⁴⁸ 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七）》（寧波：寧波出版社，2016 年），頁 5933。

正統元年（1436）會試批《書》卷云：「融會傳注，文亦暢通。」⁴⁹正統十年（1445）會試批《四書》卷云：「此篇析理詳明，善融會傳記。」⁵⁰天順六年（1462）山東鄉試批《四書》卷云：「融會傳注以成文，可佳。」⁵¹同場批《春秋》卷云：「此篇以傳注組織成文，深合題旨。」⁵²成化元年（1465）山東鄉試批《易》卷云：「融會傳注成文，殊勝他作。」⁵³成化二年（1466）會試批《書》卷云：「此作深合傳注。」⁵⁴成化十年（1474）山東鄉試批《書》卷云：「此篇本傳注立說。」⁵⁵另有批《春秋》卷云：「組織傳注，發明桓、文正譎，殆無餘蘊。」⁵⁶成化十六年（1480）山東鄉試批《四書》卷云：「融會傳注成文，佳作也。」⁵⁷以上資料皆顯示考官評卷是以傳注為審閱依據。

惟傳注之稱仍顯籠統，究竟需用何傳注？亦可於評語中尋得，如天順元年（1457）會試批《易》卷云：「此篇簡潔明淨，深合朱子《本義》。」⁵⁸成化二年會試批《易》卷云：「得朱子《本義》之旨。」⁵⁹可見《易經》依朱子《本義》為據。弘治八年（1495）山東鄉試批《春秋》卷云：「此篇專主兩盟下胡《傳》而作，非的見之學，不能也。」⁶⁰又有云：「深得胡《傳》之旨。」⁶¹表示《春秋》依胡《傳》為據。成化十六年山東鄉試批《書》卷云：「蔡《傳》釋之詳矣。作者多分截不明，殊戾本旨。」⁶²另有考官批云：「此篇本蔡《傳》作，甚得其旨。」⁶³

⁴⁹ 龔延明主編，閻真真點校：《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點校本·上）》（寧波：寧波出版社，2016年），頁68。

⁵⁰ 同前註，頁140。

⁵¹ 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三）》，頁1840。

⁵² 同前註，頁1845。

⁵³ 同前註，頁1868。

⁵⁴ 龔延明主編，閻真真點校：《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點校本·上）》，頁381。

⁵⁵ 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三）》，頁1893。

⁵⁶ 同前註，頁1896。

⁵⁷ 同前註，頁1942。

⁵⁸ 龔延明主編，閻真真點校：《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點校本·上）》，頁268。

⁵⁹ 同前註，頁379。

⁶⁰ 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三）》，頁1975。

⁶¹ 同前註，頁1976。

⁶² 同前註。

⁶³ 同前註。

見《尚書》依蔡《傳》為功令。從這些例子看來，洪武程式傳注範圍雖較廣，但考官評卷時主要限定於胡《傳》、蔡《傳》等《大全》所依之大注，雖亦有略異者，如《春秋》便有主張應博考諸傳的評語。宣德五年（1430）會試同考官蔣驥批云：「治《春秋》者當參考諸傳，以《左氏》為案，而斷以《胡氏》，不可偏廢也。」⁶⁴提出《左傳》、胡《傳》不可偏廢。但嚴格說來，這種以《左傳》史事為據，依胡《傳》義理為斷的說法，實際上仍是以胡《傳》為依歸。因此，《大全》所擇大注乃從洪武程式中限縮而來，考官閱卷時主依大注，可能由此也形成科舉功令是以《大全》為主的刻板印象。

依大注為令甲，即是依洪武程式，但《大全》尚包含小注，考官是否也同樣視小注為審閱標準？今人王赫認為從明代孔廟從祀先儒多以是否列名《大全》為考量，從而主張《大全》小注和「朱熹『大注』」一併成為官方認可的權威。⁶⁵確認小注也具有權威地位。小注若與大注相合，用小注即等於用大注，此並無問題。但若小注與大注說法有別，在面對小大注的差異時，可否存在兩種答案標準？抑或需要捨此取彼？此將影響到對小注地位的判別。在明代考官批語中，實可見到舉子以小注說法應考，卻被判定違異傳注、經旨的情形，以下略舉正德以前之例討論。

1. 宣德五年會試，考官錢習禮（1373-1461）對《四書》答卷採用小注提出質疑：「場中諸作於此題，多用饒氏之言，先後不倫，無可人意。」⁶⁶饒氏乃饒魯（1193-1264），為《四書大全》所引小注，考生據其說演繹，卻被判為先後不倫。若《大全》小注有其功令權威性，則錢習禮不應批評考生用小注說法不倫。此時距《大全》頒行方十五年，即有考官對小注提出批判，顯示小注非功令所依。

2. 成化十年順天府鄉試，同考試官章廣也批評考生過度依賴小注發揮，令人生厭，其批語云：「此題作者多泥小注，令人厭觀。是篇三節，發明高宗托喻望說納誨之切，瞭然可佳也。」⁶⁷批語實際上還涉及大小注違異的問題。此試《書》義考題為：「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蔡《傳》大注認為此文所言作礪、舟楫、霖雨是高宗托物以喻望說，表現自己納

⁶⁴ 龔延明主編，閻真真點校：《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點校本·上）》，頁24。

⁶⁵ 王赫：〈從《四書大全》的刊刻看明代經學、科舉、出版與社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4本第1分（2023年3月），頁207。

⁶⁶ 龔延明主編，閻真真點校：《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點校本·上）》，頁20。

⁶⁷ 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一）》，頁16。

誨的誠意，其云：「三日雨為霖。高宗托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⁶⁸然王安石（1021-1086）小注卻說：「作礪使成己，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⁶⁹似當實事說明。考生多據王說成文，不符蔡《傳》，遂致章廣不滿，這也表示小注不具解說權威性。

3. 成化十六年山東鄉試《禮記》考題為：「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同考試官左浚批云：「此題祖傳注立說，作者多引小注，殊戾本旨。」⁷⁰考題出自《禮記·郊特牲》，討論由夫婦擴及其他倫常之關係。《禮記大全》大注解釋云：

行敬以明其有別，故云敬章別也。有別則一本而父子親，親親之殺則義生禮作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別故也。⁷¹

行敬以明有別，指夫婦透過禮敬行為以彰別關係，其後父子等倫再由此而開展出相對應之禮義價值。這段文字看似以男女有別為倫常開展的起點，但後半部敘述重點實在強調父子之倫方為義生禮作的關鍵所在。然《大全》所引兩段小注，卻把焦點著重在男女有別，其引馬晞孟之說云：「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⁷²又引嚴陵方慤曰：「禽獸有牝牡之合而無內外之別，有生育之愛而無上下之義，故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⁷³兩段小注皆強調男女有別後才可導出父子之親，左浚可能因此認為與大注重點不同，小注實違背經傳之意。

4. 弘治八年福建鄉試《春秋》考題為：「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僖公十九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俱僖公二十一年）」此題組合三段經文，主要敘述宋襄公意圖透過楚國勢力取得盟主地位，卻為楚王所執事件。胡《傳》認為《春秋》書法目的在：「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

⁶⁸ 〔明〕胡廣等纂：《書傳大全》（明內府刊本，約西元 15 世紀），卷 5，頁 23 上。

⁶⁹ 同前註。

⁷⁰ 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三）》，頁 1923。

⁷¹ 〔明〕胡廣等纂：《禮記集說大全》（明內府刊本，約西元 15 世紀），卷 11，頁 35 下。

⁷² 同前註，頁 36 上。

⁷³ 同前註。

盟會之始也。」⁷⁴所謂外夷狄，胡安國（1074-1138）認為除懼楚國勢強外，亦傷中國之衰，至於惡諸侯失道，則在於批評宋襄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⁷⁵乃反其道而行。然同考官汪文遂批評考生受小注影響，他說：「此題本有明傳，作者多惑小注，殊失經旨。此篇一本胡《傳》，文足達理，宜錄以破群疑。」⁷⁶《春秋大全》於三段經文引述多家小注，申述胡《傳》未及之意，如引家鉉翁（1213-1297）曰：「序陳人，陳為首，陳倡盟也。序鄭于下，鄭首叛也，此楚人始會，故諱公，畧齊侯，書法特為謹嚴，不與夷狄之盟中國也。」⁷⁷認為孔子意在貶斥與會諸侯。又引張洽（1160-1237）曰：「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此會中國也，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溷於虎狼之羣也，不免宜矣。」⁷⁸批評宋襄公在缺乏武衛防備情況下，赴會遭執。相關小注多說出胡《傳》未有之義，但汪文遂並不認為這是在發揮補充，批評考生惑於小注，違背經旨。

5. 成化二十二年（1486）山西鄉試《詩》義考題為：「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同考試官王文傑批：「此題譽處，作者惑於輔注，率多失旨。此篇專主朱《傳》，以示慈惠之說，是必窮理之士。」⁷⁹王文傑認為輔廣注與朱《傳》的意涵不同。朱《傳》云：「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⁸⁰簡單表達天子為示慈惠而燕請諸侯，但輔廣小注卻說得深刻：「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翰寫其心，而無所留隱，相與燕飲，語笑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有其聲譽與和樂也。苟上之於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禍端亂萌，皆由於此，尚何能保有其安樂於長久乎？」⁸¹輔廣認為天子、諸侯燕飲必須無所保留，盡心盡意，否則將招致禍端，看似補充朱《傳》，但王文傑卻批評此非朱子之意。

6. 弘治十一年（1498）陝西鄉試《禮記》義題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

⁷⁴ 〔明〕胡廣等纂：《春秋傳義大全》（明內府刊本，約西元 15 世紀），卷 14，頁 16 下。

⁷⁵ 同前註，頁 23 下。

⁷⁶ 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八）》，頁 6658。

⁷⁷ 〔明〕胡廣：《春秋傳義大全》，卷 14，頁 16 下。

⁷⁸ 同前註，卷 23 上。

⁷⁹ 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三）》，頁 2469。

⁸⁰ 〔明〕胡廣等纂：《詩傳大全》（明內府刊本，約西元 15 世紀），卷 9，頁 42 上。

⁸¹ 同前註，頁 42 上-42 下。

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同考官葉鸞批評考生試卷時云：「大注本明白，作者失於體認，往往勾小注雜用之，牴牾殊甚。」⁸²考《禮記大全》引有嚴陵方式、長樂陳氏、西山真氏、馬氏等小注，葉鸞雖未指明是何段小注牴牾大注，但也明確表達考官批閱標準是不可違異大注。

7. 正德五年（1510）順天府鄉試，當時考生普遍採《周易大全》小注胡一桂之說，但考官侯楫卻批評此說違背朱子《本義》：「是題士子率主雙湖之說，與《本義》不合。」⁸³表明以大注為評定標準。侯美珍並據此認為這是明中葉漸不尊用《大全》的表現：「足見在功令獨尊朱、蔡諸人注本時，《大全》諸異說，對備考言，有時甚至有負面作用。」⁸⁴不過從前例來看，早在宣德年間便已有考官提出不容小注違異的情況。

8. 正德八年（1513）河南鄉試《四書》題為：「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同考試官鄒府批閱舉人李茂元答卷時云：「場中作此題者多以教養立說，殊失本旨。」⁸⁵鄒府批評考生多用教養之說立論，雖未點名出處，但《四書大全》所引兩則小注皆主教養之說。小注先引范祖禹（1041-1098）云：「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⁸⁶又引陳櫟（1252-1334）曰：「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⁸⁷范、陳小注皆認為聖人以養民為治天下之本，使民富足後再行教化。大注則說：「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⁸⁸似亦主先富民，再生禮義。那麼鄒府何以要批評教養之說？必須從李茂元的答卷來看，其云：

⁸² 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五）》，頁4062。

⁸³ 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一）》，頁258。

⁸⁴ 侯美珍：〈明科場由尊《大全》到不讀《大全》考〉，頁34。

⁸⁵ 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四）》，頁3226。

⁸⁶ 〔明〕胡廣：《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大全》（明初建刊本，約西元15世紀），卷13，頁22下。

⁸⁷ 同前註。

⁸⁸ 同前註。

聖人之治世，惟有以裕乎民，因有以化首民。蓋民富則善心生，善心生則於治亦易矣。君天下者曷亦自其先者而圖之首。昔孟子之意，蓋謂民可使之富也，亦可使之仁也。⁸⁹

李茂元認為聖人治政根本在使民心向善，令百姓富足只是步驟其一，因此小注問題在於過度強調要使民富足，將禮義教化當成次於富足之後的程序，有輕忽教化重要性的疑慮，顛倒孟子本義，故鄒府批判小注失卻本旨。

按上述所舉諸例來看，考官在批閱試卷時，乃依傳注為主，若小注與傳注違異，會直接否定小注，並未採用兩存並用的情形，這足以表示《大全》小注並非科舉功令。

三、主《大全》說之成因考

現存文獻未能發現官方詔示《大全》為令甲，或以其取代古注疏的詔令資料，且據考官批語來看，採用小注異說仍會遭黜落，顯示小注並不具備可與大注並列的權威性，但何以在《大明會典》、《禮部志稿》等書中卻出現《四書》、《五經》主《大全》的文字？以下試就相關因素釐測主《大全》說法形成之因。

（一）纂修《大全》乃對太祖之繼志述事

明成祖是否會明定《大全》為科舉令甲新制？也可從他的纂修態度來探討。楊晉龍曾歸納前賢以為明成祖修纂《大全》之動機目的有：「『炫耀文治』、『籠絡人心』及『消弭不平之氣』的動機外，還有『統一思想』和『表明自己正統地位』的目的。」⁹⁰其中表明自己正統地位的用心，更被學者以為明成祖有繼承道統的野心，如朱治即認為朱棣起用新人才修《大全》，乃「成祖以君師自任並積極占據儒家道統的體現。」⁹¹林慶彰也說朱棣纂修《大全》的動機是要：「以修書來繼承道統；能繼承道統的，自然也取得『正統』之地位。既是正統，則非篡弒。」⁹²

⁸⁹ 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四）》，頁3226。

⁹⁰ 楊晉龍：〈論《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的差異〉，《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8期（1996年3月），頁111。

⁹¹ 朱治：《元明朱子學的遞嬗：《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研究》，頁162。

⁹² 林慶彰：〈《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問題探究〉，頁366。

但何以修《大全》表明正統，就可以洗清篡弑疑慮？陳恆嵩說：「效法唐太宗、宋太宗之故伎，藉纂修典籍來博取『稽古右文』的美名，也可以藉此消除士人對篡位之舉的普遍反感心理。」⁹³因此，透過修書來接續道統，拉攏文人，乃學界對《大全》成書動機的主要觀點。晚近更有學者提出如神道設教、培養永樂朝政治班底等原因，作為明成祖從事文教著述的動機，是以學界大抵認為明成祖纂修《大全》具有多元不同之目的。此外，王鴻泰則指出成祖除接續道統，上承孔孟外，也需要對朱元璋表現出追慕情懷，其云：

朱棣對太祖皇帝的「追慕」之情，可謂無時或已，蓋其皇權之來源正築基於此，對太祖之追慕即其政權合法性之強調，此亦為開展其政治作為的起點，尤其政治文化的建構，即在此基礎逐步發展起來。⁹⁴

劉柏宏也認為明人多將成祖推動文教事業，視為是為完成太祖未竟之功，他說：

史書文集屢屢強調成祖朱棣（1360-1424）踵武太祖，不止於施政制度，更有「太祖高皇帝之心，亦成祖文皇帝之心。所謂善繼善述，莫踰于此」的讚譽。⁹⁵

朱棣藉殺戮登庸，為洗清奪位不正污點及接續皇權之正當性，他必須建立與朱元璋的密切關連，在刻意表達追慕情懷的原則下，他力圖恢復洪武法制，突顯自己才是朱元璋屬意的繼承者。於是朱棣將建文帝的政教改革一律視為背離太祖，變易成法之作為，並下詔要求恢復舊制：「朕即位以來，首詔諸司必遵舊制。」⁹⁶即使後來編纂《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他也強調這是對太祖舊規的遵循，朱棣說：

⁹³ 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臺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21。

⁹⁴ 王鴻泰：〈聖王之道——明文皇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臺大歷史學報》57期（2016年6月），頁132。

⁹⁵ 劉柏宏：〈官修經解與道統意識——以《禮記集說大全》為對象的探討〉，《漢學研究》第41卷第2期（2023年6月），頁2。

⁹⁶ 〔明〕張輔：《明太宗文皇帝實錄》（鈔本，約西元15世紀），卷16，頁6上。

一循太祖舊規，申明法制，修述禮樂，躬謁孔子、幸太學，廣招天下方聞博雅之士事，蒐羅古今，著為大典，表章正學，集《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垂訓萬世。⁹⁷

可以看出，朱棣把編修《大全》表彰正學視為是對對朱元璋的繼志述事，故而王圻也才會說頒行《大全》：「真善繼太祖之志而述其事，以昭垂後裔者也。」⁹⁸那麼在強調恢復舊制的意圖下，朱棣不可能輕易廢除朱元璋所頒定的科舉程式，改推新規。

《大全》雖以宋元傳注為依據，但取名大全，即承認其包含漢唐以來經說，朱棣說：「集諸家傳註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⁹⁹

《大全》雖以程朱為宗，但也是集諸家傳注而成，朱棣實無必要刻意在漢、宋之間劃開鴻溝，甚至要求廢棄古注疏，他要求的是將古今經說皆納入程朱體系。因此，《大全》實際上仍採用不少古注疏說法，以《書傳大全》為例，在凡例說明中便表示所採用先儒包含：「孔氏安國、劉氏向、劉氏歆、孔氏光、揚氏雄、馬氏融、鄭氏玄、高堂氏隆、王氏弼、王氏肅、孔氏穎達」¹⁰⁰等漢唐諸儒，其中引用《孔傳》解釋者計出現約 166 次；引孔穎達（574-648）《尚書正義》計約 108 次；再如《詩傳大全》中載明引用先儒姓氏包含「毛氏萇、鄭氏玄、陸氏璣、杜氏預、孔氏穎達」，¹⁰¹其中引《毛傳》計約 40 次，引鄭《箋》計約 195 次，引孔穎達《毛詩正義》計約 606 次。其他像《禮記大全》引鄭玄計有 91 次，《春秋大全》引杜氏則高達 866 次。足見漢唐注疏並未在《大全》中缺席。又如胡廣在〈禮記集說大全凡例〉中也表明援引書籍包括「漢鄭氏註、唐孔氏疏、儀禮古注疏」¹⁰²等，說明去取原則時云：「凡名物度數，據古註、《正義》、道學正論，宗程子、朱子，精義詳盡，則泛取諸家，發明未備，則足以己意。」¹⁰³採用古注疏雖是為

⁹⁷ 同前註，卷 130，頁 10 上。

⁹⁸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76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明萬曆三十年〔1602〕松江府刻本），卷 198，頁 35 上。

⁹⁹ 〔明〕張輔：《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卷 97，頁 9 上。

¹⁰⁰ 〔明〕胡廣：《書傳大全》，〈書傳大全凡例〉，頁 1 下。

¹⁰¹ 〔明〕胡廣：《詩傳大全》，〈詩傳大全凡例〉，頁 1 下。

¹⁰² 〔明〕胡廣：《禮記集說大全》，〈禮記集說大全凡例〉，頁 1 上-1 下。

¹⁰³ 同前註，頁 2 下。

發揚程朱，但編纂者並不認為此為排除古注疏。學者但見《大全》宗主宋元傳注，便偏頗以為內容只尊宋元經說，事實上《大全》性質乃如朱棣所以為：「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¹⁰⁴朱棣眼中的《大全》，乃是集古今經說，可實踐聖賢精義的集大成著述。

在刻意要表現為朱元璋繼承者的動機下，朱棣無須對古注疏提出責難廢棄，融合古今經說方能符應太祖推崇程朱、兼用古注疏的詔示，也不愧大全之名。高攀龍便說：「我成祖文皇帝益張而大之，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全》，而傳註一以濂洛關閩為主。自漢儒以下，取其同而刪其異。」¹⁰⁵高氏也認為《大全》雖以宋儒傳注為主，但採說卻是從漢儒以下進行刪削。明人張岳（1533-1588）所編《惠安縣志》中也提到：「永樂中，命儒臣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易》主程、朱，《書》蔡氏，《詩》朱氏，《春秋》胡氏，《禮記》陳皓《集說》，而采古註疏及先儒之說附其下，是謂大全。」¹⁰⁶同樣認為《大全》未汰除古注疏，肯定其兼采眾說的作法。此種論斷，可符合明成祖及纂修官員的思維。

（二）《大全》頒行學校作為經義輔助教材

永樂十三年九月《大全》修纂完成後，朱棣親自作序，說明希望藉三套《大全》達成對天下百姓的教化功用，讓天下人能睹見經書之全，探明聖賢底蘊。至於該如何實現這個目標？朱棣指示禮部云：「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之學者，令盡心講明，毋徒視為具文也。」¹⁰⁷朱棣自詡《大全》齊集聖賢精義，提供學者閱讀聖賢義理的依據，期許天下學者要能盡心講明，於是要求頒行至學校，以培育人材。朱治便分析明成祖的用意云：

明成祖視《大全》為實現其「聖王之教」的重要載體。他認為《大全》蘊含著「帝王修平之道」，是「有益世教」的治國寶典。以故《大全》編成

¹⁰⁴ 〔明〕張輔：《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卷 105，頁 2 上。

¹⁰⁵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卷 7，頁 2 下。

¹⁰⁶ 〔明〕莫尚簡：《惠安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1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影印明嘉靖刻本），卷 9，頁 10 上。

¹⁰⁷ 同前註，卷 105，頁 2 上。

進獻後，成祖於永樂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並與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頒行天下以供全國士人誦讀研習。¹⁰⁸

胡廣〈進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表〉也提到朱棣這層意圖：「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¹⁰⁹可見《大全》不只於經筵時講經所用，更是要讓天下實現儒學教育的重要教材。

頒布於天下即頒行至學校，在不少地方志記錄中，也可見學校接收到《大全》的記錄。閻春《〈四書大全〉的編纂與傳播研究》即整理明代中期地方志共計十五項記錄，證明「《四書大全》與《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一同被送到兩京十三省的儒學成為士子就學重要的學習資料。」¹¹⁰將《大全》頒行於學校，便可要求以之作為講說標準，加上學校與科舉的關係相當密切，於是《大全》頒行後一度影響科舉及學校教育，鄧元錫（1529-1593）《皇明書》即有將《大全》「頒學官，程式遵習焉」¹¹¹的記錄，王圻也說：「《大全》頒布天下，作為程式。」¹¹²可見在明成祖的推行下，《大全》進入明代學校教育體系中，成為推闡經義、程式遵習的講章根據。

明代科舉雖宗程朱經說，已較古注疏簡明，但仍有演繹解釋的需求，宋濂（1310-1381）序汪克寬（1301-1372）《詩集傳音義會通》云：「三百篇之《詩》，自子朱子親為之注，其大義固已昭如日星，讀者於事證音義有所未喻，輒昧昧而言之，譬猶不得其門而欲闖奧之入，不調其弓而思正鵠之中，抑亦難矣。」¹¹³表明讀書人仍有透過敷陳引申，增進對程朱經說理解的需要，《大全》便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編纂。朱棣曾指示修纂《大全》的方法：「《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功（切）當之言，增

¹⁰⁸ 朱治：《元明朱子學的遞嬗：〈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研究》，頁194-195。

¹⁰⁹ 〔明〕程敏政：《明文衡》，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3冊，卷5，頁20下。

¹¹⁰ 閻春：《〈四書大全〉的編纂與傳播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頁35。

¹¹¹ 〔明〕鄧元錫：《皇明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刻本），卷35，頁1下。

¹¹²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198，頁35上。

¹¹³ 〔清〕朱彝尊：《經義考》，卷112，頁597。

附于下。」¹¹⁴可見其本意為採集諸儒解釋以輔翼發明經文傳注。王恕(1416-1508)說《大全》：「仍以前五子傳註為主，而以其餘諸儒註釋分書之，以備參考，甚盛典也。」¹¹⁵他認為諸儒註釋作為參考備用，傳注才是主要標準。余繼登(1544-1600)也說：「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首以傳註頒庠序訓士；成祖文皇帝首集經書大全，羽翼傳注。」¹¹⁶又說：「又懼學者惑於異說，無所適從，頒布經書集註於學宮，俾之講習。我成祖復擇諸儒論說，有裨聖經者，纂為《大全》，以羽翼之。」¹¹⁷認為《大全》所採諸儒經說是為輔助羽翼傳注。王演疇亦云：「成祖文皇帝統一聖真，命儒臣輯經書《大全》，是朱程之為經翼，而《大全》之為傳翼也。」¹¹⁸程朱傳注輔翼經文，《大全》則輔翼程朱傳注，作為解釋參考，幫助理解所用。

在頒行科舉定式及《大全》於學校的運作下，程朱傳注成為功令所尊。但由於未見官方明定要遵奉《大全》為功令，則棄注疏、主《大全》乃是學子自己的選擇。考生除刻苦閱讀程式書籍外，也需揣測考試走向趨勢，在朝廷初頒《大全》時，學子自會傾注心力攻讀，楊守陳(1425-1849)〈送徐生昇序〉提到：「《五經四書大全》，此講說之師也；歷科三試程文，此筆削之師也。何必人師哉！」¹¹⁹《大全》羅列各家說法以解釋經傳，等於講義材料；且明代官方會收錄科舉程文，作為示範，故所謂以《大全》為講說之師，代表此乃官方專門提供學子理解經義傳注的依據。

(三) 主《大全》說法之形成

《大全》既作為學子遵習之講義，於初出時成為流行所趨，可能因此導致主《大全》說法出現。首先，丘濬(1421-1495)《大學衍義補》介紹明初科舉程式的發展過程便提到：

¹¹⁴ [明]張輔：《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卷94，頁4下。

¹¹⁵ [明]王恕：《石渠意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明正德刻本），頁1下。

¹¹⁶ [明]余繼登：《淡然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1冊，卷2，頁14上。

¹¹⁷ 同前註，卷2，頁19下。

¹¹⁸ [明]王演疇：《古學齋文集》，卷1，〈尚書集解序〉，頁又6上。

¹¹⁹ [明]楊守陳：《楊文懿公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伍輯》第1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明弘治十二年〔1499〕楊茂仁刻本），卷5，頁4上。

我太祖皇帝於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四書》義主朱氏《集註章句》，《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澹《集說》焉。¹²⁰

丘濬為明孝宗時文淵閣大學士，為理學名臣，影響力頗大。此文評述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歷數明初科舉實施過程，把洪武三年開科、十七年科舉程式、成祖修《大全》相提並論，還指出《五經大全》中的《易》、《書》、《詩》如舊，《春秋》改宗胡安國，《禮記》加宗陳澹。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強調經學考試應各立家法，其云：「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¹²¹除以注疏為主外，朱子還強調必須兼取宋儒，融合古今各家經說以為標準。〈學校貢舉私議〉影響元明科舉極深，周春健即說：「在元代當時人看來，科舉程式規定『兼用古注疏』是受了朱子〈學校貢舉私議〉的直接影響。」¹²²丘濬受此議啟發，欲證明從洪武程式到《四書五經大全》，乃在實踐朱子兼融各家之倡導。不過，從他敘述《五經大全》宗主傳注之用語看，也存在其對科舉程式變化之認識，如他說《易》、《詩》、《書》「如舊」，則三經大全並不違背洪武程式；述《禮記》說「又加以」陳澹《集說》，表示《禮記大全》是在古注疏程式下，再加上《禮記集說》。獨論《春秋》宗胡氏《傳》言「惟」，表示除《春秋大全》宗胡氏《傳》與洪武程式有較大的差異，其他《大全》都承襲前制而來。丘濬並非簡單講述程式變化，實有意將明代科舉解釋成朝〈學校貢舉私議〉融合諸家之建議方向發展。只是由於他將三次程式並舉，便容易予人修《大全》乃變改功令的印象，這並非丘濬的意思，因為他在同篇文章中又說：「洪武三年詔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明年春二月禮部

¹²⁰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2冊，卷9，頁17下-18下。

¹²¹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訂：《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卷69，頁3482。

¹²² 周春健：〈元代科考程式「兼用古注疏」考論〉，《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頁112。

會試，……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試格式。」¹²³以洪武十七年所定規範即為當時科試格式，也表示科舉程式並未因《大全》而發生變改。

丘濬將洪武程式與《大全》並列為明初科舉事務，這種排列次序多被其他文人採用，如專門輯錄明代史事的張萱（1558-1641）《西園聞見錄》引沈昌世之言，也是先述十七年程式，再說：

及永樂間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加以陳澠《集說》焉。¹²⁴

沈昌世全倣丘濬之說，把十七年程式與《五經大全》所取傳注並列，就不免令人誤解宗主《大全》為程式變改。又章潢（1527-1608）《圖書編》也節引丘濬文意來論述明代選舉之法，其說：

我太祖于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肆我太宗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澠《集說》焉。¹²⁵

另外，黃道周（1583-1646）論〈國朝取士之法〉也再度引用：

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澠《集註》焉。¹²⁶

黃道周為明末學者，他將將此段文字設定為明朝取士之法，可見晚明確實已逐漸有視《大全》為科舉令甲的意見出現。《大明會典》、《禮部志稿》等書可能也

¹²³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卷9，頁19上-19下。

¹²⁴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民國二十九年〔1940〕哈佛燕京學社印本），卷44，頁21上-21下。

¹²⁵ 〔明〕章潢：《圖書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72冊，卷107，頁15上。

¹²⁶ 〔明〕黃道周：《博物典彙》，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24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明崇禎刻本），卷11，頁24下。

是在這種觀念發展下，在列舉洪武十七年程式後，直接說此後《四書》、《五經》主《大全》，但又無法找到明確詔令印證，遂只能以簡單的注解帶過，也讓後人誤會科舉主《大全》為明朝令甲。

主《大全》之說雖出現於明人政書史料文字中，但語焉不詳，未能提出明確詔令依據，因此不能排除乃編纂者個人的判斷。《大全》頒行於學校，宗主傳注又有別於洪武程式，遂有以為《大全》改變程式的誤會。加上明人說法模糊，也使後人誤以《大全》為科舉令甲。崇禎年間，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的陳懿典（1554-1638）便說：「我朝太祖高皇帝定為經義取士，成祖文皇帝纂修《五經性理大全》，海內奉為著蔡，遵為令甲。」¹²⁷文德翼（約1649年前後在世）也說：「今功令一以《五經四書大全》為諸士準繩，其說莫敢稍戾于程朱。」¹²⁸明末清初的孫承澤（1592-1676）認為洪武程式「不足以盡聖意，乃於永樂中纂《四書五經大全》，皆令主之。……每申嚴新說之禁，并出入于《大全》者皆以為異說。」¹²⁹這兩位崇禎年間的文人，一致認為明朝是以《大全》為取士標準，不可違異，但明代前、中期之間，皆未如此述說，可見這是晚明時逐漸產生的觀點，也因而影響到清儒見解。

四、結論

《四書五經大全》歷來被視為明代科考令甲，對明代科舉及經學發展影響深遠，甚至也被認為是造成明代經學衰落之關鍵。然而明代文人對於永樂年間曾有改變科舉程式的詔令也曾提出質疑，從而引起本文欲探討《大全》究竟是否被明定為令甲？其對科舉的影響又如何？透過分析相關史料文獻，從而得出下列四點結果：

第一，遍查明代詔令彙編、實錄史料、典章政書、文集著述，皆未能發現永樂年間以《四書五經大全》取代洪武科舉成式的命令。朱棣頒行《大全》，實為永樂朝重大文教政策，若朱棣要以《大全》取代洪武定式，不可能未見於官方詔

¹²⁷ [明]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79冊（北京：北京圖書館，2000年，影印明萬曆丙辰〔1616〕秀水曹憲來校刊本），卷20，頁36下。

¹²⁸ [明]文德翼：《求是堂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4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2000年，影印明末刻本），卷14，頁40上。

¹²⁹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8冊，卷40，頁29下。

令資料中。由此推論，朱棣蓋未曾下過變改科舉令甲之詔令。

第二，根據科舉錄所載考官批語分析，得出閱卷批審依據主為《大全》之大注，對於違異大注之小注異說，往往視為背離經旨，進而予以黜落。由此推論，《大全》小注並非官方明定之令甲，小注並不具有解釋權威性。

第三，結合朱棣修纂《大全》意圖及《大全》實際仍兼採漢宋經說，可知朱棣將《大全》當成是對洪武舊制的繼承發揚，是為學校提供科考程式的講說材料。由此推論，朱棣修纂《大全》，乃欲使之作為傳注之輔翼，提供學子理解備考之官方講義。

第四，大注雖承洪武程式而來，但也限縮於宋人傳注中，因而明儒有將頒行《大全》視為科舉程式演變發展之一環者，也因此導致對功令認識不清。由此推論，科舉主《大全》之說，乃明儒在演繹明代政令下，逐漸發生的誤解。

本文主要成果在修正將《四書五經大全》視為明代科考令甲的說法，《大全》內容繁灝，大、小注之間多有矛盾現象，若以全書作為為令甲，執行上有實際困難。但後人受到「主《大全》」說的影響，誤解科舉令甲自永樂後便宗主《大全》。事實上，明代科舉令甲一直是以洪武年間所定科舉規範為標準，朱棣編纂《大全》，除擇定洪武程式傳注作為大注，並廣輯諸儒經說以為小注，目的在於融合古今經說，提供學校作為講義教材，俾令學子有所依循，目的在於輔助令甲，非為修改令甲。明儒所說的主《大全》，實際上乃主大注，小注的功能在幫助對大注之理解，非為令甲所在。

徵引書目

〔傳統文獻〕

-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訂：《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
- 〔明〕孔貞運：《皇明詔制》，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5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明崇禎七年刻本。
- 〔明〕文德翼：《求是堂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4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2000年，影印明末刻本。
-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12冊，臺南縣：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影印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 〔明〕王世懋：《王奉常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3冊，臺南縣：莊嚴文化公司，1995年，影印明萬曆間刻本。
-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明萬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
- 〔明〕王恕：《石渠意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明正德刻本。
- 〔明〕王演疇：《古學齋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伍輯》第1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明萬曆四十七年刻本。
-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明〕申時行修：《大明會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9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明萬曆內府刻本。
- 〔明〕余繼登：《淡然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明〕俞汝楫：《禮部志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明〕姚希孟：《姚孟長全集》，明崇禎蘇州張叔籟刊本，約西元17世紀。
- 〔明〕姚舜牧：《來恩堂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0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明萬曆末年刊天啟間增補本。

- 〔明〕姚廣孝等：《明太祖高皇帝實錄》，鈔本，約西元 14 世紀。
- 〔明〕胡忻：《欲焚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第 3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清康熙四十二年胡恆升刻本。
- 〔明〕胡廣：《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大全》，明初建刊本，約西元 15 世紀。
- _____等纂：《春秋傳義大全》，明內府刊本，約西元 15 世紀。
- _____：《書傳大全》，明內府刊本，約西元 15 世紀。
- _____：《詩傳大全》，明內府刊本，約西元 15 世紀。
- _____：《禮記集說大全》，明內府刊本，約西元 15 世紀。
- _____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書大全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 年。
- 〔明〕徐學聚：《國朝典彙》，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65 冊，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6 年，影印明天啟四年徐與參刻本。
- 〔明〕祝允明：《懷星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明〕袁仁：《砭蔡編》，明萬曆間嘉興袁氏刊本，約西元 16 世紀。
-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74 冊，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 年，影印明崇禎二年佩蘭居刻本。
- 〔明〕袁黃：《遊藝塾續文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1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明萬曆三十年刻本。
- 〔明〕馬世奇：《澹寧居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第 113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明〕張朝瑞：《皇明貢舉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82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明萬曆刻本。
-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6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民國二十九年哈佛燕京學社印本。
- 〔明〕張輔：《明太宗文皇帝實錄》，鈔本，約西元 15 世紀。
- 〔明〕章潢：《圖書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明〕莫尚簡：《惠安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10 冊，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影印明嘉靖刻本。

〔明〕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9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2000 年，影印明萬曆丙辰秀水曹憲來校刊本。

〔明〕程敏政：《明文衡》，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明〕黃光昇：《昭代典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35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明萬曆二十八年周曰校萬卷樓刻本。

〔明〕黃宗羲：《明文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5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明〕黃瑜：《雙槐歲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6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明嘉靖三十八年陸延枝刻本。

〔明〕黃道周：《博物典彙》，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24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明崇禎刻本。

〔明〕黃鳳翔：《田亭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5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刻本。

〔明〕楊守陳：《楊文懿公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伍輯》第 1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明弘治十二年楊茂仁刻本。

〔明〕楊慎：《升菴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明〕雷禮等：《皇明大政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35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明萬曆三十年博古堂刻本。

〔明〕蔡獻臣：《清白堂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陸輯》第 2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明崇禎刻本。

〔明〕鄧元錫：《皇明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31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清〕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影印中華書局 1936 年版《四部備要》本。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原刊本。

〔清〕費密：《弘道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4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民國九年大關唐氏怡蘭堂本。

〔清〕劉師培著，萬仕國點校：《國學發微：外五種》，揚州：廣陵書社，2015年。

〔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樂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近人論著〕

王赫：〈從《四書大全》的刊刻看明代經學、科舉、出版與社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4本第1分，2023年3月，頁207-277。

王鴻泰：〈聖王之道——明文皇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臺大歷史學報》57期，2016年6月，頁117-181。

朱治：《元明朱子學的遞嬗：《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李威熊：〈明代經學發展的主流與旁支〉，收入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年。

周春健：〈元代科考程式「兼用古注疏」考論〉，《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頁106-114。

林慶彰：〈《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問題探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創刊號，1991年3月，頁361-383。

侯美珍：〈明科場由尊《大全》到不讀《大全》考〉，《中國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夏之卷，頁28-36。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

郭萬金：《明代科舉與文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臺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

陳時龍：〈明代詔令的類型及舉例〉，《明史研究論叢》第8輯，2010年7月，頁130-151。

楊晉龍：〈論《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的差異〉，《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8

期，1996年3月，頁105-146。

劉柏宏：〈永樂朝之前陳澹《禮記集說》的傳播及其相關問題探討〉，《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53期，2018年9月，頁73-111。

——：〈官修經解與道統意識——以《禮記集說大全》為對象的探討〉，《漢學研究》第41卷第2期，2023年6月，頁1-39。

閻春：《《四書大全》的編纂與傳播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龔延明主編，閻真真點校：《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16年。

——：《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16年。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Jiang, Long-Xiang*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was ever decreed as the first-class imperial examination by Emperor Ming Chengzu. It also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studi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fficial documents, historical records, literary works, and the comments from Exam Officers of the Ming Dynasty, examining the texts that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t was found that during the Yongle era of the Ming Dynasty, there was no order to replace the Hongwu system with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and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should be viewed as a practice by Zhu Di of the Hongwu system. Therefor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scholars' view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as the official text for the Ming Dynasty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s incorrect. It proves that the belief in the primacy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riginated from a misunderstanding by late Ming Confucian scholars. Throughout the Ming Dynasty,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consistently adhered to the Hongwu-era standards, and the minor annotations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served merely as reading aids, not as authoritative texts for the examinations.

Keywords: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ive Classics*,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our Books*, classical studies in M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